

印刷与政治

《时报》与晚清中国的改革文化

「加拿大」季家珍 (Joan Judge)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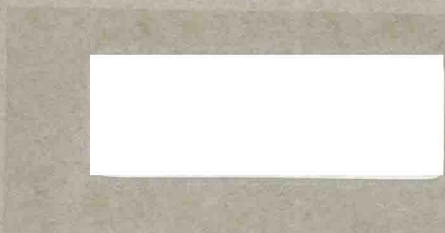
王樊一婧 译

Print and Politics:

'Shibao' and the culture of reform in late Qing China



時報



GUANGDONG JOHNSON UNIVERSITY PRESS
广东约翰逊大学出版社



印刷与政治

《时报》与晚清中国的改革文化

「加拿大」季家珍 (Joan Judge)

著

王樊一婧译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桂林·



PRINT AND POLITICS: "SHIBAO" AND THE CULTURE OF REFORM IN
LATE QING CHINA by Joan Judge was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English by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Copyright © 1997 by the Board of Trustees of the Leland Stanford Junior University.
All rights reserved. This translation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www.sup.org.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桂图登字: 20-2012-143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印刷与政治:《时报》与晚清中国的改革文化 / (加)季家珍著;
王樊一婧译.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5.7

书名原文: Print and Politics: 'SHIBAO' AND THE CULTURE OF
REFORM IN LATE QING CHINA

ISBN 978-7-5495-6887-1

I. ①印… II. ①季…②王… III. ①报纸—研究—中国—清后期
②改革—文化—研究—中国—清后期 IV. ①G219.295.2②G12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162131 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西桂林市中华路 22 号 邮政编码: 541001)
网址: <http://www.bbtpress.com>

出版人: 何林夏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衡阳顺地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湖南省衡阳市雁峰区园艺村 9 号 邮政编码: 421008)

开本: 880 mm × 1 240 mm 1/32

印张: 10.25 字数: 274 千字

2015 年 7 月第 1 版 2015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45.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序 言

加拿大汉学家季家珍(Joan Judge)的《印刷与政治:〈时报〉与晚清中国的改革文化》一书即将付梓,译者王樊一婧博士嘱我作序,而我自忖对此领域没有多少涉猎,故觉作序实不敢当,只能勉为其难写点由此想到的题外话,权作序言。

王樊一婧博士与我有同乡同门之谊。我们都是西域乌鲁木齐人,两家相距不过十几分钟的车程,后来又都报考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方汉奇先生的博士生,前后相距十几年。作为其同乡同门,她的一片美意自然难以轻拂。

本书作者与译者均为女性,于是不由想到一个问题:自从晚清之际新闻业与新闻学萌发以来,中国新闻学的女性学者之成长历程大略呈现了三个时段。新中国之前统归第一个时段,其时新闻学领域的女性学者几乎付之阙如。至少,以我的孤陋寡闻尚未见到一位稍有名望的新闻“班昭”,但说不定将来有心人能够考证出哪位巾帼才俊,于是这里只能说“几乎”。

新中国前三十年属于第二个时段。随着男女平权、妇女解放等社会主义平等政治的广泛普及,女性身影也开始活跃在新闻学领域。新中国开国领袖毛泽东有句家喻户晓的名言——妇女能顶半边天。1958年9月13日,他在武汉接见妇女干部时又用了——一个比喻说:好比一个人有两只手,缺少一只也不行。(《毛泽东年谱》)不过,由于这一时期仅有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北京广播学院等寥寥数家新闻教学点,女性学者自然寥若晨星,傅显明、成美、张之华、刘明华、林珊、曹璐等均为代表。这些在我心里犹如一

颗颗明亮星辰的名字,对年轻一代可能显得遥远生疏了,但若提及当今学界一些专家出其门下,如胡正荣教授受业于曹璐与成美、黄煜教授师从于林珊等,也许就不难想象她们的历史地位了。

不言而喻,第三个时段是近三十多年。其间,女性学者在新闻学领域不仅日见其多,而且仿佛“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这一繁花渐欲迷人眼的景观一方面缘于综合国力推进下的新闻事业突飞猛进,一方面也由于新闻学教育与研究的“大发展、大繁荣”,仅从新世纪以来新闻传播教学点陡增千家,同当年寥寥数家相比天差地别,就可以略见一斑了。如今,无论新闻界,还是新闻学,万紫千红照眼明早已成为有目共睹的事实。在新闻院系中,女生不仅往往多于男生,而且每每强于男生。清华大学新闻学院某年招生,一个班四十来人,只有一位男生,于是运动会孤零零举着队旗走在前面。这种状况好像延伸到新闻媒体,以至于不少媒体不得不内定“只招男生,不招女生”,否则无法平衡自身的性别比例。至于新闻学领域,女性学者的阵容及其水平与声望同样引人注目,涌现了一批巾帼不让须眉的佼佼者。如毕业于北京广播学院新闻系(现中国传媒大学新闻学院)、留学于加拿大西门菲莎大学传播学院的赵月枝教授,成为新闻传播学科第一位女性“长江学者”,并以其出色的学术成果赢得海内外广泛认可。

或许,这样一脉学术源流也不失为一种研究课题,看看从中是否可以开掘与开辟社会学、政治学、历史学以及新闻学的一些新领域。仅看刘明华教授的经历就颇耐人寻味。她与已故郑超然教授伉俪一生,传为佳话,而他们夫妇在新中国成立时一为放牛娃,一为童养媳。正是新中国、新社会给予了他们读书深造的机会,由此双双成为新中国新闻学的一代名师。

作为一位“八〇后”,王樊一婧博士在北京师范大学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已发表了多篇核心期刊论文,投考方门后境界洞开,学业精进,同时在加拿大、美国等名校转益多师。相较前辈,他们这一代又具有自身的特征与优势,包括更加开放的学术视野、更加理

性的知识心态、更加系统的专业训练等,尤其在新闻与传播、理论与实践、中国与世界的维度上更加融会贯通,因此有望为学术共同体做出更多无愧中国学者的贡献,就像赵月枝教授达到的学术高度和思想深度。刚好今年赵月枝接受香港中文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邱林川等的访谈,也为新生代学者——无论男女提供了一个值得深思的学术样本,其中一系列提醒不仅富有现实针对性与专业反思性,而且一针见血,令人警醒,如:

最可怕的是传播研究中“去政治化”的政治和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下的“集体政治无意识”,即把西方反共意识形态内化为自己的意识形态,把美国冷战时代的传播学当作“客观”的社会科学,把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有关市场和国家的一系列假设及其政治目标——建立资产阶级宪政理想国和与之匹配、但被隐去了其(资产)阶级性质的、事实上也只是个“历史范畴”的“公共领域”——当作规范性研究前提。(香港中文大学《传播与社会学刊》总第28期第9页)

王顾左右而言他,要说的也就这些,不当之处,还望批评。

李彬

2014年于清华大学

中文版序言

几年前,有学者曾打算将《印刷与政治》译成中文,但很遗憾未果。所以当我在多伦多遇到王樊一婧并得知她很有兴趣将这本书译成中文时,我非常高兴。一婧是中国新闻史学研究泰斗方汉奇的学生,她自己在研究方面也很有潜能,当时我就很笃定,她应该能够公允地将这本书以中文的面貌呈现出来。有趣的是,我的这本书的主体部分是在美国的哥伦比亚大学完成的,而一婧也曾在哥伦比亚大学学习时完成了翻译这本书的大部分工作。

自从《印刷与政治》在1996年出版之后,关于中国报刊的研究也一直非常繁荣。关于《申报》《点石斋画报》《小说月报》等一些重要期刊的研究,许多英文和中文的专著有所涉及,同时,涉及“小报”的研究也不少。图书馆的数字化工程使得今天的报刊史研究学者能够较为容易地获取大量的原始材料。

与此同时,学者们在读解出版史方面也发展出新的研究方法。我本人目前也在参与一项关于中国早期期刊数据库的项目,并以期在此基础上形成新的研究范式。从中我想,如果我今天重写《印刷与政治》的话,我大致会完成一本完全不同的书。

我非常高兴这本书能够被更为广大的中国读者们看到。同时我希望中国的学者们能够注意到我所遗漏的地方,以新的方法来研究《时报》,并发掘更多有关出版人、编辑、报人、副刊等的背景材料。《妇女时报》也是一份我关注和研究较多的中文期刊,随着对《妇女时报》的了解,我也注意到,出版《时报》的出版社“有正书局”,其附属的影像工作室“民影照相馆”,以及其创办者之一狄葆

贤,我们都还有许多背景信息可以进一步发掘。当然,对于《时报》本身也还有许多值得研究的地方,例如《时报》中的诗歌、小说类栏目,我仅仅在本书中简略带过,以及其中有很多极有意涵的讽刺画,我真诚地希望今后能有相关的详细研究出现。

现在呈现在你面前的这本书,并不能提供一个关于晚清中国这份非常重要的报纸的某种确定性的叙述,而是提供了从社会、政治、文化等角度出发而进行的一种解读,而这也是晚清至辛亥前夕出版人、报人们与爱国志士们的关切。总而言之,我最大的期望是这本书在中国的出版能够抛砖引玉,帮助今后产生更多的关于这一时代、这些报刊,以及丰富多元的媒介环境的研究。

季家珍

2014年3月24日

目 录

contents

引言 新兴中间阶层的重要性 /1

第一部分 新型中层社会的形成 /19

第一章 晚清印刷媒介的力量：政治媒体的兴起 /21

第二章 《时报》记者：中层社会中政治与文化 的中间人 /42

第三章 中层社会的理论建构：古典的与当代 的思想资源 /73

第二部分 新式君子：报人与“国人” /103

序言 /105

第四章 从臣民到国民 /110

第五章 锻造新国民 /131

第六章 百姓的原因 /155

第三部分 “道貌岸然的恶棍”: 报人与当权者的对
阵 /181

序言 /183

第七章 “民权”和“官权” /188

第八章 中层社会的制度化 /206

第九章 改革派的根据之地 /231

结论 中层社会的命运 /254

参考文献 /260

固有名称翻译对照表 /305

引言 新兴中间阶层的重要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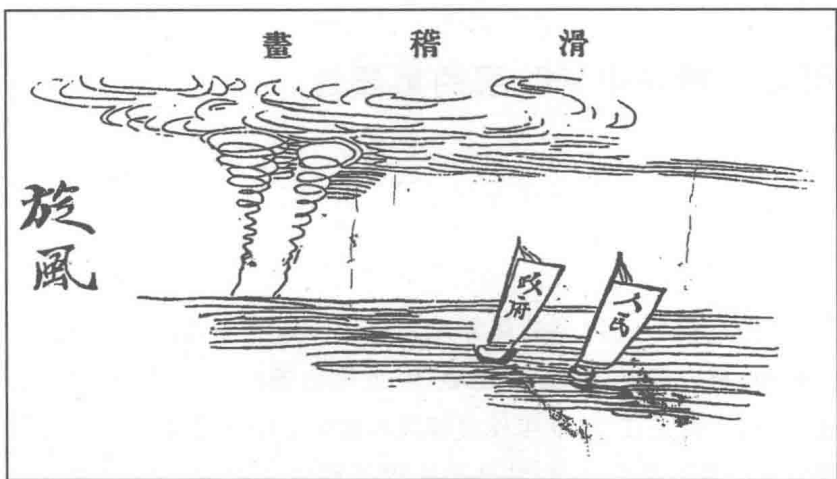
1904年的4月,上海租界内召开了一系列秘密会议,与会的三位中,有一位就是清政府悬赏10万两白银取其头颅的梁启超;还有一位,就是在1900年反对清政府的事变中起到重要作用的狄葆贤^①。时年春季,他们并非要密谋推翻清政府或者现行统治体系,而是打算通过办一份报纸的方式,来与政治反对势力相抗衡。

由梁启超、狄葆贤以及其他报人创办的新日报《时报》,将印刷与政治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以创办政论媒体的方式,发展出了一种媒介协商的新途径,并由此推进了一种新的政治模式,即宪政改革。他们也将自己视作沟通上层王朝贵族和下层百姓的“中等社会”成员。从这一居中的立场出发,身兼出版人和政治活动家的他们,一方面努力试图将统治阶层的权力核心向下转移,另一方面试图使普通民众的力量向上贯通。这种居中的立场,既包括由他们的新闻写作所占据的隐喻性空间,也包括由他们的社会与政治创举所构成的现实空间,共同构成了晚清的中间阶层(the middle realm)。^②

本书以晚清新型出版业——中间阶层的卓著机构和重要文

^① 丁文江、赵丰田:《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336页;戈公振:《中国报学史》,北京:中国新闻出版社,1985年,第117—118页。

^② 作者注:我在本书中将“报人”(Journalist)和“出版人”(Publist)两个词交替使用,因为在晚清中国,“报人”一词不仅具有我们今天所熟知的“新闻记者”的意思,同时也具有时事评论员的意思。



《旋风》，《时报》，1907年8月5日

本——为中心，讲述了这一新兴话语空间的形成、扩大及其重要性。《时报》，作为当时最有影响力的改革机构，既是本书的对象，又是论据。作为研究晚清社会的进路之一，报纸也被视作社会中发生的多种话语和实践的缩影，揭示了新的文化方式路径的展开与传统政治实践的转型。因此，对《时报》的这一考察，能够帮助我们对20世纪初的中国有一个更细致的认知，而这一阶段曾经往往被武断地喻为王朝的衰落、1911年革命的先声，或者是观念的过渡时期。将清朝统治的最后几年视作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会使我们重新发现这一阶段社会、政治、文化形态的问题，并且为我们重新反思后续的20世纪中国开辟新的路径。

晚清中间阶层是话语、实践、文化多重互动的结果，介于印刷文本及其政治与机构语境和基于两者的文化假设之间。因此，本书在分析力图改革晚清社会的新型出版人之意图的同时，也同样考察政治、社会以及文化环境如何直接或者间接地冲击和影响这些意图。本书将《时报》中的文章当作政治文本和文化作品来阅读，关注报人们所使用的语言、立论的文化背景，以及他们为了进

一步阐释改革主张所关注的权威信源。



《改革官制》，《时报》，1907年4月9日

这一对晚清中国文化与政治的考察受到新的文化史，特别是印刷文化研究的启发。这一领域最典型的当属 Roger Chartier 的研究，他试图“重新思考传统上认为不言自明的社会空间……与它所反映了或扭曲了的表象之间的关系”，力图去建构“一种‘文化结构’与‘社会结构’关系的新的明确表达”。具体而言，Chartier 分析了在固有的社会制度下，“不断增加的印刷出版物的流通是如何改变了社交性的模式，创造了新观点，（并且）改变了与当局的关系”。^① Michael Warner，虽然并非一位文化历史学家，但在他的关于 18 世纪美国的《印刷品的文化意义》一书中也采用了相似的方

^① Chartier:《文化史》，第 14、48 页。

法。他试图通过考察媒介与它的政治之间的交互决定性来解释社会变化,并试图从中得到一个文化上的解释。^①

虽然近年来许多欧美文化研究的学者将他们的注意力转向出版业,并试图分析“中层历史”,但对晚清中国作如此的研究,本书还是第一次。^②使用文化历史学的方法来审视中国早期的政治出版业,提出了不同的问题,也从这一阶段先前的研究中寻求新的结论。^③然而,晚清中国的政治叙事在很大程度上被 1911 年的革命事件所建构,而本书则不愿成为“革命先声”的又一次解读。本书在 1911 年作结并不是因为革命本身,而是因为革命造成的环境间接地导致了《时报》最具独创性和影响力的历史阶段的结束。因此,对《时报》早期历史的考察并非单单分析晚清的衰落所导致的事件,更重要的是去考察这些事件在新闻纸上被如何构建,以及这些表征如何反过来产生出新的政治与社会方式,其影响或许曾有助于革命,但最终超越了革命。

这种文化历史学的方法也因其不再强调“大人物”的作用而不同于晚清中国的精英化叙述模式。当然,晚清社会中一些多产的作家,有影响力的思想家,视野独特的活动家出现在本书中,但他们并非主角。取而代之的是,这里叙述的是他们的思想如何在新式出版人的推动下、在一个更广泛的社会语境中一体化的历史。

① Warner, Michael:《共和信:18 世纪美国的出版与公共领域》,剑桥,麻省:哈佛大学出版社,1990。

② Daniel Moran 曾用“来自中层的历史”(“history from middle”)一词来形容期刊和书籍在文化中所扮演的角色。关于法国出版业的研究,可参见 Jeremy D. Popkin《革命新闻:法国的出版业 1789—1799》,以及 Chisick;俄罗斯方面的研究参见 McReynolds;美国方面的研究参见 Schudson。

③ 这一学派为今天的研究提供了许多背景。英语的相关资料来源包括:Wright, Gasster:《中国知识分子》(Chinese Intellectuals), Esherick, Fincer, Lust; Chang Peng-yuan:“立宪派”(Constitutionalists); Chang Hao, Liang Chi-chao; P. Huang, Liang Chi-chao; Chu。

在宏观思想领域与实践性政治关切之间,整体性的宏观政治与地区性的微观政治之间,学习西方的意欲和长久的儒家信仰之间,报人们栖居其间,在理论和实践上构成了晚清中国的中间阶层。作为新兴的文化企业家和政治活动家,他们往往身兼数职——编辑、女性导师、翻译家、小说家等——努力传播新知。

以往对晚清的研究常常容易陷入两分法的境地:传统与现代,西方影响与本土回应,改革与革命^①,对中间阶层的开掘同样也建立在近期的一些研究之上,这些研究都丰富了以往的两分法的研究。这一探索方式揭示了中国传统风气与西方思潮的融合之处,并由新的政治灵感催生了新的综合动力,他们既非一律的改革者,亦非绝对的革命派。《时报》的主笔们为传统的儒家思想灌注了新的元素,将西方思想转化成为世人熟悉的文化结构,张力与断裂逐渐产生,社会与政治新的可能性被开启。正是这一互动过程规定了晚清中层领域的内涵,并且使 20 世纪初的中国踏上了独特的历史轨迹。

中间阶层与出版业

作为上述互动过程的发生地,出版业在晚清中层社会中扮演了一个多效的角色,是文化价值再生产和激励社会整合的一个途径,也是最早和最重要的政治工具。许多中西方研究出版业的历史学家和理论家都非常关注出版业与政治之间的重要联系,特别

① 关于两分法的批评传统,特别是“传统/现代”“西方影响/中国回应”此类作法,可参见 P.Cohen《在中国发现历史》第 9—96 页。

是出版与革命,出版人与革命斗士。^①非常广泛的历史记录也证实了这种联系。布尔什维克的倡导者列宁曾断言,报纸既是革命事业的物质基础,又是其象征。法国革命报人 Jacques-Pierre Brissot 也曾说过:“没有报纸的参与,美国的革命就无法胜利。”晚清最重要的报界理论家梁启超也曾在 1912 年说过:“共和中国的建立应该是一场笔墨革命,而非流血革命。”^②

尽管在许多国家出版业都发挥过政治功能,但是晚清中国的报业角色仍旧显得尤为重要,它既不拥有政党体系,也不拥有国家议会代表。独立于朝廷而为阅读大众所可触,政治出版提供了改革者发表他们政治构想的论坛之一。新式杂志为晚清社会的不同阶层开启了一个协商的平台,也为改革报人挑战帝国权威、表达民怨提供了可能,鼓励人们围绕政府政策而辩论,启迪国人认识到改革帝国王权结构的紧迫需求。

从 1904 年创刊时起,《时报》的相关报人们的首要任务就是通过宪政改革分裂和削弱中央集权。当晚清政府在 1901 年 1 月 29 日正式宣布开始实施新政,《时报》也刊登了逐步实施宪政的强制性告示。此后,报人的主要任务就变成暴露宪政改革立法承诺与

① 在出版业与政治关系的研究中,Robert E. Park 在《报刊的自然历史》一文(“The Natural History of Newspaper”,见施拉姆编《大众传播》,伊利诺伊大学出版社,1960 年,第 22 页)中称:“报纸是一个政治机构。”关于德国方面的研究,见 Moran 的《Towards the Century of Words: Johann Cotta and the Politics of the Public Realm in Germany, 1795—1832》,第 11—18 页。法国方面的研究可见 Popkin 的《革命新闻》,英国方面的研究可参见 Curran。关于出版与革命方面的研究,可参见 Popkin《革命新闻》与《媒介与革命》。

② Popkin:《媒介与革命》,第 13—15 页;Elizabeth Eisenstein:《民众的讲坛:政客宣传的新形式》(The tribune of the People: A new species of Demagogue),参见 Chisick:《法国革命中的出版业》(The Press in the French Revolution),第 145—159 页;梁启超:《梁任公先生演说集》,北京:正蒙印书局,1912 年,第 4 页。

帝国政治现实之间的断裂。这相互联系的二者之间日趋激烈的竞争,体现在报人的笔下即是中央集权与民意代表之间的较量。

报人和官僚在宪政改革分裂和削弱中央集权这两个问题上的冲突,在晚清统治的最后时间里逐步升级。当朝廷终于在1906年11月6日颁布了众望所归的官制改革决议,《时报》的主创者们认识到,事实上,政府是在利用宪政假象来将经济和军事力量集权化。^①这种集权化的措施还更明显地体现在清政府收回所有区域铁路的控制权,这一问题集中体现在1907年苏州—杭州—宁波铁路问题的大讨论。当皇室单方面决定向英国借款完成铁路建设时,报人们指责皇室丧权辱国,批评政府公然地滥用职权,谴责清廷限制公共意见的表达和操纵民意代表的行径。他们抨击1908年1月出台的《大清报律》和1908年8月的条款强加给言论自由的限制。《宪法大纲》赋予了清廷在中国立宪方面独一无二的特权。当1909年省级议会成立、民意代表主体生成之时,报人们则批评政府对这些新的机构权能上的限制。

民意代表与中央集权之间的矛盾在1910—1911年间达到极点,自1906年起逐步建立的反对力量为报人们提供了更多的素材。1910年,政府拒绝了国会请愿运动提出的立即召开国家议会的要求。1911年5月,保路运动要求各地拥有更大自治权和保护中国国家权益的呼吁被法院置于不顾,清政府宣布所有的铁路收归国有,这样就更大程度地依赖外国贷款来发展中国的铁路系统。

随着敌意不断累加,保路运动的参与者、请愿者、同情他们的

① 清廷曾在1906年9月应允进行官方的体制改革,宣布预备立宪,见故宫档案1:44。关于报人的回应,可参见《论今后》,《时报》,1906年12月5日,报人们抱怨政府仅仅创设了一个新的“邮传部”,并没有对政府其他部门做重要革新,与此同时,“当局立刻收紧了陆军部和财政部(Duzhibu Finance),将这些权力集中在满人手中”。见《改革官制》,《时报》,1907年1月26日。